

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袁洪权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在当前的文学研究现状里,我们却为之感到担忧:史料的忽视被置于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更为严重。本文基于这样的现状,主要谈及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史料的发掘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史料的发掘是对过去文学研究错误观点的纠正;史料的发掘可以为现当代文学目前研究的乏力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史料的发掘可以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

【关键词】文学史料;研究现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意义;文学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6307(2004)04-0020-05

Literatural Data and Pesearch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utuse

YUAN Hong-quan

(Xichang College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615022, Sichuan)

Abstract: Literatural data is the basis of literatural research, but in present research we fell worried: the igrorance of literatural data have locatecl in a very surprising degree, especiall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ssage is based on the present-research condition, it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xcavating literatural data. Finally, forming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al data is an a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worring.

Key word: Literatural data; the present research; research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ignificance;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al data

一、问题的提出

“史料的搜集、鉴别、理解和运用,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1)(P1),这是每位国学研究者的真实体会。在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项基本功,它为学术研究的学理化走向提供了有力的规范和保障,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当下的研究者继承和发扬。当前,学术研究在商业文化气息的影响下逐渐摆脱了学理的规范,走向主体的主观意志的发挥,正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经响遍中国大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主观因素过分注重。一部文学专著

的撰写,即使没有充足的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照样可以写出来。史料被人忽视了,研究史料被有的文学研究者认为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文学研究。有的研究者甚至对史料进行歪曲,完全忽视客观存在的史料提供的史实。前不久曾经阅读郭宛著的《浪漫人生——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一书中关于胡适与韦莲司、陈衡哲、江东秀、曹佩声四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作者完全忽视已经公开的胡适日记这样重要的文学史实,由于笔者学历有限、视野不够开阔,对胡适与陈衡哲、曹佩声两位女士之间的感情变化不是很了解,但是胡适与韦莲司、江东秀之间的感情关系却与郭宛的著述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里引用郭著

收稿日期:2004-09-10

作者简介:袁洪权(1978-),男,土家族,文学硕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

的关于胡适与韦莲司、江东秀的一段感情纠葛论述:

“这时,却杀出个‘老夫人’。原来,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夫人对他们两人私订终身的情感有所觉察。她发现这个东方青年要带走自己的女儿,她不能让他这么做!韦莲夫人发怒了,发誓对这件事反对到底。

……胡适回到家中,心中十分懊丧。家里人问他看见了‘新娘’没有,他便撒谎说:‘见过了,很好!’当母亲问他时,他只好说了实话。母亲大为生气,认为东秀及家人太对不住儿子了。胡适却反劝他母亲不要错怪东秀。^[2]

从1910年—1918年的胡适日记以及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里,笔者看出有两处史料错误:一是韦莲夫人对胡适与韦莲司之间感情的阻挠;二是胡适的母亲对江东秀的不满。据笔者对《胡适日记》的阅读,他的日记中对这两位女士的感情纠葛并不是这样的,韦莲司与胡适之间的感情完全是朋友的感情,并且韦莲夫人把胡适看成是真诚的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交往。而胡适与江东秀的婚姻结合,他的母亲并没有对江东秀产生反感,是江东秀提前进入胡适的家庭为他的母亲在生活上给予极大的帮助,赢得胡适的母亲的好感。尽管胡适的内心里有诸多的想法,但是迫于母亲的压力和尊严,胡适认可了这场婚姻。而著者为了追求读者阅读的兴趣,对史料的真实史实进行有意地曲解(建立在对史料、史实的篡改基础上)。这明显是对史实的不尊重,得出的结论和进行的推论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从事这样的文学研究是令人担忧的,也是令人害怕的。

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作为文学研究主体的文学研究者自己应该相当清楚,樊骏先生曾经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的谈及自己的看法:

“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我们研究和评价的任务也远不只是给对象定个高低,而在于准确、全面、深入地认识这段文学历史,尤其是作家作品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以及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进而总结出创作规律和文学工作文学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这段文学历史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3]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没有扎扎实实的文学史料作为有力的论述材料,是没有意义的。它很大程度上浪费了物力、人力、财力,而得出的结论既没有现实意义,又没有理论的参考价值。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至少我们可以从胡适后来的人生经历中看出胡适的女性观,说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

的冲击,而他与江东秀的结合,又可以看出他的传统文化观的影响,从而可进一步探视胡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真实心态。史料的存在要求研究者尊重史料的真实事实,作为有学术素养的研究者他绝对不会止于此,史料的发掘更是他的任务。正如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否定认识历史实际的历史研究所必经的阶段,或是必不可逾越的基础层次,而倡言什么研究历史要从历史实际出发,恰恰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4](P220)”,文学史料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充分的文学史料,“什么论或史都建立不起来。即使有了什么正确的观点,那也仅仅是空论,发空论的绝对没有说服力的。^[5](P1)不可否认,由于当前学术研究的氛围的影响,文学史料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加上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众多的研究者看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这导致从事文学史科学研究的只是那些甘于寂寞的人,他们默默地发掘新的学术史料,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着自己的努力,而他们的成就却被人忽视,甚至他们本人被人瞧不起。

这里,笔者想起了1985年的时候马良春先生强烈呼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的建议的可贵性,但那时的呼声是极其微弱的,这是清醒者的孤独与寂寞,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文学研究方法热的高潮阶段,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被文学研究主体广泛采用,进而推进自己的文学研究事业,这呼声被高潮的声音掩盖是不可避免的。

二、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这门专业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并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向度。但正是由于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现当代文学专业逐渐走向了萎缩,尤为突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向。据笔者的阅读量来看,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有一定的重复性、学术风气浮躁等不良的倾向,而这些不良倾向主要是由于文学史料的缺乏导致的,所以,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文学史料的发掘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过去被演化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学领域的革命演进,但是,清醒的文学研究者逐渐产生了怀疑,对文学史的真实面目进行反思。在思想解禁的政治前提下,伴随着文学史料的发掘,文学研究主体逐渐摆脱了过去文学研究的“注经阐释”式的写作模式,而是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它使这门学科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这里笔者仅以两个例子作为证明。一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对张爱玲的一些史料的发现,使我们不仅知道张爱玲是文学天才,而且在绘画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张爱玲的戏剧剧本的发现,为我们真实描绘张爱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又提供了新的资料佐证,为张爱玲的全面评价提供基础,也是对中国戏剧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二是孟芳关于钱玄同先生的一篇佚文——《给李锦明先生的信》——的发现,为文学研究者重新评价钱玄同的地位提供了新的史料。以往人们对钱玄同的评价都遵从鲁迅先生在钱玄同逝世时给予的评价,尽管鲁迅先生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个敢于站出来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钱玄同,但是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钱玄同的评价其实并不是客观公允的。《给李锦明先生的信》这篇佚文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钱玄同,正如孟芳所说的那样:

“此时钱玄同的变化看似后退,实为清醒。偏激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本于其对思维方式的某些方面作着的修正。沉静平和的心态显然比愤激呐喊时对事物的认识趋于深入全面,更易发见或说更愿道出事物的本质,显然这更有利于文学、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钱玄同的坚执,实出于其急进的性格和忧国忧民的自觉的责任感,这方面和五四时期的他似乎没有改变,因为现实的许多方面有违科学、民主的精神,没有按他们的理想有所改变,不合乎五四时钱玄同们的设想,故而还要顽强地坚持原有的立场,针对有反复的现实执拗地发出反复的‘呐喊’。”^{[61][272]}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钱玄同并不是一个逐渐趋于保守的文化人,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文学、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这则佚文的重新发掘,我们不可能对钱玄同作出公正的评价,而他的历史地位也无法弄清楚,完善钱玄同的研究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体会到,史料的发掘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专业,使它步入全

面、系统的发展里程之中。

2、文学史料的发掘是对过去文学研究错误观点的纠正

在一定的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否认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一是由于文学史料的缺乏,使研究主体无法摆脱;二是文学研究主体的自身原因造成的。文学研究主体的自身原因造成的例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导致研究者不敢说出自己的真话,比如丽尼在解放战争是有功劳的,他窃取国民党军事情报,并通过胡风转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建国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发生,作家丽尼的历史地位一直无法界定,要对丽尼进行历史定位就必须对胡风本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由于政治上的对胡风事件的定位以及胡风个人的定性,使丽尼蒙受了长期的不白之冤。本来这则史料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发现,但仍出现这种失误,其原因由于主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导致,特定的政治环境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丽尼的最终定论还是在胡风事件的平反基础之后才完全开展的。而由于文学史料的缺乏使文学研究出现错误是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巴金文学生涯的时间是以1929年《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算起,当文学研究者在对过去的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中却发现:1922年巴金已经在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新诗。这纠正了过去对巴金文学生涯的错误认定,虽然只是一个小的方面,而对巴金的文学研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它至少使巴金的创作历程显得更加丰富。与此相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925年《老张的哲学》这篇小说被认为是老舍的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但是随着文学史料的发现,研究者们发现那是错误的,因为1921年在《海外新声》杂志(由留日学生在日本发行)上发现了老舍的小说和新诗。

其实我们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正是在史料的发掘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的,从错误走向正确、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非系统性逐渐走向系统性,可见文学史料的发掘对该专业的重要性。在这里,笔者相信伴随着大量文学史料的发掘,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逐渐向真理迈进。

3、文学史料的发掘可以为现当代文学目前研究的乏力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

曾经有一段时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

是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步入误区：众多的研究者认为30年的文学史经历了70、80年的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这个领域基本上都被翻耕了一遍，用邱紫华先生的话说：“这块领地已经不是泥土，而是石油。”普遍对现代文学研究感到悲观，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走向了绝境。跟着这种认识倾向，2003年在浙江师范大学还专门开了一个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生长点的研讨会，认为怎样怎样可以给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在阅读与会者参会提供的论文综述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人深思的：众多的与会专家都没有对文学史料产生兴趣。在他们的眼里，文学史料不会也不可能对学术产生影响，他们关注的是文学话语的引入与运用。其实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文学史料的研究者在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眼里的地位是如何的。笔者不否认文学话语的引入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的激活带来新的研究空间。

但为什么会出现文学研究的乏力也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思考。文学史料的缺乏不可否认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大量的文学史料的淹没，使许多的研究空白点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这里仅以钱理群先生近年的学术努力为例进行说明。钱理群先生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的专家，并且属于一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成就，而是在鲁迅、周作人研究的领域的基础上，对沦陷区的文学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出版了《沦陷区文学史料选》（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进行积极的努力。由于他的努力，沦陷区的文学研究逐渐走向了新的研究水平，这其实就是文学史料的发掘带来的。试想：要是没有钱理群先生的努力，目前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吗？冯良春、丁景唐两位先生是笔者非常敬佩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他们自70年代末以来，一直勤于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事业可以说他们是在寂寞之中度过的。在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他们自己也成为文学研究大家，特别是两位先生对30年代左翼文学史料的掌握与运用，在国内左翼文学研究领域算得上是权威。他们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史料的发掘，使他们的学术研究在纵向的发展中走向深入。作为后辈文学研究者，我们应该学习前辈们那种甘于寂寞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心态，从基本的文学史料入手，为自己的文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

础。

4、文学史料的发掘可以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

同时，文学史料的发掘还可以使文学研究主体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走向完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是辩证统一的，他们都是建立在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上。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先生既是文学研究家，又是文学史科学专家，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既有学理的规范，又有文学史料的大量引用，真正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学术水平。50年代出现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曾经产生众多的文学史专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并不是很多，而《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当今还产生着重要影响。如果要真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必须阅读的参考书，尽管它在50年代就已经出版，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者。王瑶先生的学术研究影响了几代文学研究者，由于自己在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品格，他的文学研究有着独特性的意义，丁尔纲先生曾经对王瑶先生的这段话记忆犹新：

“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无产阶级不需要夸大一些东西或掩盖一些东西来表现自己的立场。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党性是统一的。我们反对客观主义，要在论述中表现倾向性，但倾向性只能表现在科学的历史真实中，表现在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中，而不能是外加的拔高一些甚么，或者贬低一些甚么，也不需要回避什么东西。”^[7]

从这段话我们体会到王瑶先生对文学史料的高度重视程度。如果排除他的恩师朱自清先生的言传身教，我想：文学史料的挖掘对他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他不愧于一代学者，是我们的楷模。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在中国现代文学方向勤勤恳恳工作六十年的时间，其实这六十年的时间就是他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六十年。当我们阅读他的《书话》、《晦庵书话》这两本小册子，对他广博的知识感到由衷的敬佩。知道唐弢先生生平，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文学史料的积累，他的学术素质逐渐走向完善。冯至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唐弢先生未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是一大憾事，因为“一，他曾广泛地搜集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二，他跟文学界现实有多方面的接触；三，他对于如

何编写文学史有自成体系的见解,最后,他的文笔生动,可以把文学史写活。^{[8] (P89)}即使阅读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也会为他文学史料的丰富而翔实感到惊叹。从王瑶先生和唐弢先生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文学史料这一基础性的工作上的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最终造就了他们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楷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权威,他自称曾经有一段时间感到困惑,那是80年代文学研究方法热的兴起。但由于深受学术前辈的影响,他踏踏实实地对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终于成为研究大家,也戒除了自己曾经浮躁的学术心态,他关于50年代文学的高质量论文陆陆续续地发表出来、有学术水准的专著的出版,人们看到他的成就的同时,还要去关注他取得成就背后的不懈努力的经过,那就是他对文学史料的工作。如果没有潜心于史料的执着,他的浮躁学术心态会摆正吗?正是在对文学史料的发掘过程中,洪子诚先生逐渐完善了自己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

其实,当我们把视野放开阔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研究者,他们学术成就的取得都跟文学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是分不开的,阿英、李何林、马良春、丁景唐、钱理群、严家炎、单世雄、桑逢康、王锦厚等人都是建立在文学史料的基础上。当前这样的浮躁学术环境里,由于商业化气

息的冲击,人们在追求学术数量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学术质量,研究者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受到众多的人的质疑。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者敲响了警钟:必须完善自我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从基础的文学史料做起。

结语: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

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我们觉得有必要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这样一门学科。樊骏先生曾经指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9],这给从事文学史料学研究者提出严格的要求:发掘、搜集、辨别、整理文学史料,是环环相扣的工作环节,文学史料研究者必须尊重客观的文学史料事实;不尊重史料,就是不尊重历史,改动史料,就是歪曲历史真相的第一步。这样的“史料”和这样的史料工作,除了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引入歧途,还能有什么价值呢?^{[10] (P220)}所以,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必须做到文学史料的真实性,要求从事文学史料的研究者不能篡改文学史料的客观事实,同时,文学史料工作应该突出其意义,摆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史料管理,多渠道的文学史料的交流等,都应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陈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序言[M].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
- [2]郭宛.浪漫人生——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M].台海出版社,2004年1月版,引用时参阅2004年3月30日上海《新闻午报》第39版面。
- [3]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A].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C],P194,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 [4]王正平.史学理论与方法[M].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版。
- [5]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 [6]孟芳.从一篇佚文看钱玄同文学观的坚持与变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 [7]丁尔纲.王瑶先生和全国首届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J].《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22日出版。
- [8]冯至.《刻苦耕耘,尽瘁终生》[J].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2月22日出版。
- [9]他的“宏大”和“系统”,既包含这项工作的复杂庞大性,又包括史料工作之外的社会工程的庞杂性。具体参阅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2月22日、5月22日、11月22日出版。
- [10]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A].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C].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版。